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14

# 梦幻虚构和时空体

## ——巴赫金诗学的现实主义问题

刘亚斌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韦勒克提出文学的虚构本性,与现实主义文论产生矛盾冲突。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是现实主义文论得以构建的关键所在,时空观念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的梦幻虚构显示出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化传统,对资本主义、俄罗斯社会的本质认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经历的体验与思考,广场节庆活动则是其最终根源。广场狂欢化的现实及其世界性感知方式深刻影响了陀氏小说的内容表现和文本形式,形成其中介性空间和瞬间性时间相结合的时空体观念。从时空体形式及其比例关系来看,欧洲小说有其具体的时空表现和现实的场所标记。广场时空体让现实和梦幻、常态和怪诞、除旧和新生的世界交织和转换,复调小说体现实主义的最高意义,巴赫金诗学推动了现实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巴赫金诗学;现实主义;梦幻虚构;时空体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88-09

就一种文学运动或者文学流派来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是沿着浪漫主义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时恰好是处于现实主义作为时代文学最高形式的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是主张现实主义的,并且服务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目的。20世纪各种理论思潮兴起,文学理论史上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都致力于文学文本和语言形式,追求文学自足性或由语言而自成世界。作为后期新批评的杰出代表,韦勒克(René Wellek)提出文学的虚构本性,即现实主义亦是一种虚构,似乎要取缔文学的现实主义或现实性,与现实主义文论产生矛盾冲突。在苏维埃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既有的形式主义文论差别较大,如何通过现实主义文论将其关联起来,成为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话题,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成为现实主义文论得以构建的关键所在,它们都涉及具体的时空观念。本文将探讨巴赫金(M. M. Bakhtin)在陀氏小说的复调分析中,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希望借此推动现实主义文论的深入研究。

### 一、广场效应——梦幻表现的文化现实

怎样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陀氏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梦幻,首先便是复调小说的虚幻表现及其文学传统的事实关联。韦勒克对陀氏小说在世界范围的批评史作过评述,论文开篇就说陀氏早年拥有声誉而成为批评的主流。别林斯基评价陀氏第二部小说《双重人格》时说,整部作品非常怪诞,不像文学作品。在引述别氏的观点后,韦勒克总结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要么是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们的充满同情心的朋友,要么是做怪诞梦的幻想家、病态灵魂的解剖家”<sup>[1]271-272</sup>,这两种态度成为整个欧洲批评陀氏文学的主调。就后者而言,陀氏作品被认为是疯狂可怕的、颓废象征的、神秘难读的、受虐痛苦的和带有预言家性质的,人类内在的深层幻想或心理变态占据了主要内容。如尼古拉·米哈伊罗夫斯基(Nikolay Mikhailovsky)就说陀氏是个残酷的天才、虐待狂,有对痛苦的癖好,创造虐待者和被虐待者的社会秩序;法国沃盖伯爵(Melchior de Vogüé)称其是监狱的耶利米和疯人院的莎士比亚,充满异域的苦难宗教,作品让

收稿日期:2024-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界面生产视域下新媒介文艺转型机理研究”(22FZWB085)

作者简介:刘亚斌(1976—),男,江西安福人,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人恐惧;尼采认为陀氏小说是颓废派的;梅列日科夫说陀氏是象征主义者,呈现各种观念的悲剧;舍斯托夫称《地下室手记》是非理性主义。几乎所有批评家都看到了陀氏小说创作中各种恐怖的、疯狂的、邪恶的虚幻意识和梦魇图景,这些虚构的幻象让其与所谓的现实主义文论毫无瓜葛,甚至是种背道而驰的创作风格,就像别林斯基站在现实主义角度所批评的那样。

陀氏小说中的虚构幻想有其俄罗斯的宗教传统,如东正教炼狱观念中的时间问题、地狱狂欢模式、生死博弈、圣母形象“穿入者”功能和地狱的复活性等;这些构想早已扎根于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如12世纪伪经代表性文本《圣母马利亚启示录》就记载过相关内容,还有傻瓜形象、圣愚人的笑声等都存在于俄罗斯的民间文学里;俄罗斯节庆中的风俗惯例,如送冬节的饮食、焚烧文化和伊万-库巴拉节的洗浴文化等,都表现出巴赫金所总结出的民间节庆里的全民参与性、对话开放性和颠覆愉悦性等狂欢化特色,以至于国内学者王志耕先生认为,“从俄罗斯民间节庆的文化功能来推导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同样具有坚实的论据”<sup>[2]305</sup>。然而,巴赫金更多的是将陀氏小说的虚幻写法与整个欧洲文学传统关联起来,而非仅是斯拉夫或俄罗斯文化传统,从而使复调小说的构建更具深广的文化渊源,并且在着重于传承欧洲文学的基础上彰显以陀氏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的创造性,是一种历史诗学的理论构建。

再来看陀氏文学的狂欢节来源。在著述中,巴赫金很清楚陀氏小说的梦幻性,专门挑选晚期两篇“幻想小说”加以分析,试图以成熟时期的作品来揭晓其创作的谜底。《豆粒》写于1873年,《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作于1877年。后者从题目就可知其内容是异常的梦境,即“‘梦幻讽刺’和带有空想成分的‘幻想游历’”<sup>[3]195</sup>。像陀氏很多小说那样,主人公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总是不停地思考,经历种种幻觉,以解决思想问题。《豆粒》的讲述者则“处于疯狂的边沿(酒狂的边缘)”<sup>[3]181</sup>,“他逃避公正的准则,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受到所有人的鄙视也鄙视所有的人”<sup>[3]181</sup>。两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像《地下室的人》中那样的作为意识、思想和幻觉的主体,而非社会关系中的人,文学内容都是关于狂欢化场景和事件、梦想的天堂、墓地葬礼、僧侣死者、腐烂的尸体和怪癖、凶残、疯狂、自杀以及不知廉耻的行为等。从文学

史上讲,这些充满幻想、宗教和神话要素的文学内容,显然早已出现在霍夫曼、爱伦·坡等人的小说中,《罪与罚》中奸笑的老太婆还让人想起普希金笔下的老伯爵夫人和黑桃皇后的形象。也就是说,不仅浪漫主义文学有梦魇、神话和象征意义,现实性的小说也常用梦来表现人物意识、心理和对社会的虚构与想象。这些作品对陀氏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涉及现实主义与梦想幻觉、思想意识和宗教神话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了解,现实主义文论并不仅仅是说只要有其文学传统,就具备现实主义所有的标准和条件。也就是说,有其文学传统是种历史的真实,也有诗学上的传承性,但是,不太可能有文论家会认为仅依赖于此就能定义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的话有点传统因素的文学便都是现实主义文学了;也不会有人说以前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表现了幻觉和梦魇之类的内容,就可反过来将具有相同内容的陀氏小说归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再进一步说,即便小说人物表现出超出社会现实外的虚构和想象(因为人无法排除做梦和幻想的可能,它是一种真实或现实的存在),难道就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文学吗?显然,这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关联,巴赫金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陀氏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他继续挖掘,进而发现在所有那些狂欢场景中,人物疯狂的幻觉表现和对立思想意识的碰撞,与欧洲民间节庆活动有密切的关联,“至于这一传统的非文学的来源,即狂欢节,很可能作家们甚至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它”<sup>[3]208</sup>。人们接受了狂欢文学和文化传统,却忘记了其现实的来源。狂欢节所带来的那种感受,对世界的平等和自由的疯狂追求,对社会秩序大胆的颠覆和挑衅,且高度兴奋时所产生的身体愉悦和迷狂幻觉,还仍然积淀在人们的意识结构中,时不时地就会暴露出来,影响到作家创作的艺术观察和构思视角,从而让自己的作品具有遥远的现实来源。同时,巴赫金认为,节庆活动中“反映当代现实,甚至是同活着的同代人进行不客气但却很亲昵的交谈”<sup>[3]142</sup>,这为现实生活中的狂欢节和小说文体的狂欢化找到了共通点,两者都具有当代性,也就是说,作家运用狂欢体创作小说,其作品必然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从而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

最后是广场狂欢文化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依据。对狂欢文化社会根源的探索,使复调小说的

源初性现实得以彰显出来,那么,陀氏小说是否有其当下性的社会依据呢?当下性的具体表现又在哪里呢?这一问题才会涉及到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内涵基础:诗人创作有其社会现实的来源,作品中有作家对时代状况的观察和感知。巴赫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有广场性的狂欢化效应,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中,由于国内的特殊情况,尤其像彼得堡这样的都市,各种机构力量尖锐对立,如同广场上的节庆活动,众声喧哗、相互冲突和怪诞频出,让热爱新闻工作的陀氏体会到一种“独到而又鲜明的狂欢式生活感知”,“仿佛那是‘一个奇异的幻想’,是一场梦,是介乎于现实与幻觉虚构之间的某种东西”<sup>[3]213</sup>,于是,陀氏在《穷人》《脆弱的心》《舅舅的梦》和《罪与罚》等小说中逐渐表现出这种狂欢化效果,并在《彼得堡梦幻的诗文》等著述中加以回忆性的证实,将狂欢化书写理论化,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根源和动力,最终也是其文体风格之所在;此外,陀氏从事过编辑工作,形成了一种将报刊看作各种社会力量在“一日的横切面上”<sup>[3]39</sup>的复杂交织和对抗斗争的独特视角,而他本人的职业和现实经历更是让其狂欢化的艺术观察获得了来自个体生活和经验的有力支撑。

综上所述,如何让陀氏小说中大量的虚构、幻觉和梦魇现象落实到现实主义的维度上,巴赫金的研究思路分三步走,最终落到广场时空体上。在历史诗学里,先是将怪诞现象当作文学史,甚至文化史的书写现象,有俄罗斯、欧洲民间文学和宗教文化的根源,甚至浪漫主义、现实性文学都有梦幻虚构的做法,陀氏创作有其当代性体现。接着便将其感知模式溯源自欧洲节日庆典活动中人们对广场狂欢效应的体悟和文化积淀,将其当作一种富有传统深蕴的构思与书写结构,狂欢化书写有其真正的现实来源,更重要的是,狂欢节生活和狂欢化小说取得了当下性的同一,节庆活动在广场进行,而广场体验折射出时空观念的变化,进而“反映出文化态度和生活经验的根本转变”<sup>[4]preface III</sup>,既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生活,也影响了对世界的认知和书写,它让所有一切,包括梦想幻觉、思想意识和社会事件等都在广场时空内呈现出来,在小说中,主人公面临着末日审判的无限逼近,而必须不断地袒露其内在意识和隐蔽的个人生活。第三,在巴赫金眼里,那个拥有现实来源即广场效应的伟大传统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

俄罗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尤其是与彼得堡社会力量复杂斗争的梦幻情景高度相似,加上陀氏本人的编辑经历和喜好体验,共同构建出复调小说的现实主义本色。

在此,历史诗学体现出其特有的广场时空体观念,被用于解析陀氏小说复调特性的最终根源。我们认为,节庆日的广场作为时空体的物质存在形式,既有处于现实生活而无法脱离的一面,又有超越社会性和秩序的一面,让人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知体验,属于加冕与脱冕同时进行且角色互换的狂欢化世界,其平等自由的互动、交流和尽情的表演引发种种新鲜的、怪诞的事件。空间时间化的累积转变为时间空间化的输出,所有的生活体验、当下感受和未来的企望全都在这一时刻爆发出来,这本身足以让人震惊、恐怖,但心却向往之,甚至醉心于此,这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吸引。巴赫金在阐明陀氏独特的报章见解时,特别强调其“一日”时间,正是这个短暂的时间将彼得堡各种经年累月的社会力量呈现出来,它们复杂的、过往的恩怨纠结、对抗斗争和对自身利益的执着追求都在那张小小的空间化“一日”的报刊上展开,让读者感受、体验和想象。也就是说,报刊就如同广场那样的空间,是狂欢化的,也是时空体既分裂又统一的体现,时间性经验(包含了空间生活经验)被压缩成意识和思想,却由空间性互动(囊括了互动的的时间性)展现出来,这是时空体形式上的狂欢化;互动的双方或社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现实的狂欢化表演,里面自然也夹杂了时代性要素、意识潜流、记忆思想、幻觉构成和生活的梦魇,这是作者体会到的现实时空体的狂欢化。接下来,让我们分析巴赫金时空体观念在陀氏小说文本上的狂欢化表现。

## 二、时空形式——虚幻风格的文本事实

在巴赫金看来,时空体的物质表现形式或现实存在形式就是欧洲节日庆典广场,在那里时空交织,来自不同地方空间、拥有不同生活体验的人们一起来到广场上参加庆典仪式,展开狂欢化活动,在一块时间被压平的空间内进行亲昵交际、放浪怪诞和自由发挥的活动,所有交际和对话都被集中在广场内,他们各自都具有主体性,并力图将其表现出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世界及其感知模式,这就是复调小说艺术观察及其思维结构的历史现实的由来。巴赫金由这种作为欧洲传统文化和社

会现实的广场活动去观察和思考资本主义社会、陀氏所处的俄罗斯和彼得堡的时代状况,发现它们同样具有狂欢化的现实本质,从而为复调小说这种新文体找到了作为欧洲历史、俄罗斯现实、彼得堡状况和作者经历喜好的社会性,这是历史诗学的当下性合一,也是现实主义文论的某种胜利。

我们应该看到,巴赫金将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高度统一,其诗学既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现实溯源,也有历史脉络的传承和交代,更有作家面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对自我认知的把握,并用广场的狂欢化来实现所有要素的贯通,结论在于作家观察到当下即是广场,就是狂欢化。换言之,它既是指一种历史的事实,也是一种现实的真实,更是作家基于历史传统与社会生活的艺术观察和感知体验的真相。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无论是历史传承还是时代状况,作者观察思考与本质把握的社会现实、过去真相和未来面向,现实主义文论的胜利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外在现实的影响要素,还要深入到具体的、物化的小说文本中,它包括小说所描绘的内容及其采用的形式结构等文本要素。于此,巴赫金对现实主义文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详细分析了陀氏小说在主题内容上的事实表现,而且深入到文本形式方面的现实化作法,一方面继续采用历史诗学的方法,追溯了复调小说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脉络,在互文本中突显其特殊的事实表现;另一方面则力图体现出陀氏小说文本形式和文体结构的复调特性。巴赫金依然保持其广场狂欢化视角的同一性,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并最终以后者为物质基础,前者为精神表征,以其结构模式来使两者获得统一,即节日庆典的现实内容和小说文本的表现形式相互吻合,文学作品、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都有其广场的狂欢化表现。简言之,节日庆典的广场性成为了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也是陀氏在彼得堡等地经历、思考和个性化的事实,还是其所有小说内容和形式的最终真相。复调小说就是狂欢化的、广场型的时空体的文学表现。下面,我们将讨论小说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巴赫金提出,陀氏在处理其小说时,有意更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模式,采用另一种更具现实主义底色的写法。作家认定既有的做法实际上偏离了真实性航向,如用典型形象去联结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个性和抽象共通,往往集中在带有“这一个”特征的塑造上,这导致小说围绕它而展

开,使其他人物物化或异化,他们没有自己的个性世界,只能围绕典型形象而转。此外,作家还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典型性特征的塑造上,以个体特性作为最高原则来压倒其他一切,甚至不顾及事实状况,将不属于自我的东西也强行归属于自我,将他者身上无法知晓的东西也让自我知晓。最后,为了塑造典型形象,必须有现实基础,典型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现实生活是典型的现实生活,两者合二为一,依照完整、圆满的情节塑造出固化、封闭的人物形象。然而,陀氏小说并不这样做。典型形象被主人公所取代,每个他者都是主人公,就连作者也是其中一个,他们都是作为平等自由的对话者而存在,即作品不是仅有自在之我的存在,而且要确立他者之我(自在之你)的主体性,不能将他者客体化、对象化和次要化,从而克服孤僻的唯我主义倾向,将他者或别人“由影子变成真正的现实”<sup>[3]10</sup>,并在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再者,所有人物都是主人公,都是作为对话者而存在,都是意识、思想和立场的主体,因此,他们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苦思冥想的都是思想,“每个人都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sup>[3]113</sup>,在所有对话中,主人公都“努力想‘解决’自己的那个‘思想’”<sup>[3]115</sup>,但是思想并非形象,而是通过思想去表现那个整体的人本身。也就是说,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拥有社会现实的经历和时间性考量,都能将其全部化为对话空间中的思想、价值和立场的表达与抗辩,所有的现实生活及其情节设置都变得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可有可无、漂浮不定,“是的,情节并不重要,但是冲突是存在的”<sup>[5]33</sup>,它们服从于其思想意识概括和呈现的需要,而真正的脉络情节却是其对话交流、思想辩驳及其所附带要素的历程。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陀氏小说的虚幻、梦魇和可怕的欲望表演,它们基本上都是作为意识、思想和价值立场的交流材料,用来考验主人公,要主人公去面对、去思考、去阐发、去判断、去对话。狂欢节上的世界性感知,其理解、评价、思考和互动表现都是当下性的,有尖锐的社会针对性,就是和同时代活着的人的交流,他们依赖自己的现实经验和自由的想象来揭露、批判和表达梦想,尤其是其中互相对立、驳斥和抗辩的对话内容,表现在文学体裁上就具有杂糅性和多声部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广场上神王秩序和民众狂欢的二元对立,是中

世纪便有的两种生活的对抗:“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sup>[3]170</sup>。自文艺复兴后,狂欢节的潮流,包括亲昵混乱、自由不拘、辱骂讥讽和种种易位、怪诞、换装及其象征意义,都闯入日常生活和现实领域;而马戏团、假面表演和民间滑稽戏等则流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世界观甚至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于是,我们看到,在巴赫金眼中,陀氏小说的复调性在文本内容上就表现出每个平等的、自由的、自在的主人公就各种二元对立的问题和观念,如理智与疯狂、聪明与愚蠢、现实与虚幻、地狱与天堂等,在不停地质问、应答和抗辩,或者数种思想观念在头脑里左右互搏、自我告白,这些意识都由某个主人公来代表,他们都是个体中的思想,或思想中的个体。

就形式上说,巴赫金认为,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和狂欢节。它们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体,各体裁之间都有多种过渡形态,狂欢体这条线索就“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个变体”<sup>[3]143</sup>。我们观察到,三种小说体裁及其来源中只有狂欢节是现实事件,这让复调小说这个变体有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基础。欧洲传统节庆广场上的狂欢化影响了陀氏的小说文本,除了被人笑谑的国王加冕脱冕仪式外,插科打诨、不得体的亲昵和俯就的描写,梦境、幻觉和潜意识的讲述,以及粗鄙的、冒险的、不敬神的污言秽语,以及怪诞、冲突的场景与异常、乖僻的行为等,都充斥在书写文字中,并以各种变体形式加以呈现,用对话性结构贯穿起来。早期的苏格拉底对话是影响较为深远的狂欢体类型,还有索夫龙的歌舞剧、筵席交谈的文学作品、回忆文学、抨击文学、田园诗和梅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以及其他一些体裁,狂欢体发展源远流长、相当广泛、种类繁多。巴赫金着重讨论了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体的情况,后世学者则据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对话中,主人公经常和人在集市、运动场和街头等公共场合对话,也在家庭宴会上交谈,实际上都是一种广场的狂欢。当然,其对话文本有其多样性,可分为狭义对话、形式对话和广

义对话三种类型,前者包括苏格拉底“没有自己观点,仅对他人及其观点的后果,让其看到自身知识视野局限”的早期对话(Early Socratic Dialogue)、自己陈述的及物对话(Transitive Dialogue)、打败对手维护立场的辩论对话(Polemical Dialogue)和教导性的教条对话(Dogmatic Dialogues);形式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一个配角;而广义对话则由长篇大论构成,“一个对话参与者发表长篇演讲”,是“更广义上的对话”<sup>[6]7-24</sup>,但没有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性。马丁·弗莱泽(Matthias Freise)认为,文学时代在一系列对话过程中产生,“在对话的基础上重新尝试理解时代将是合理的”<sup>[7]30</sup>,而其对话形式则有阐释对话、辩论对话、结构对话和历时对话四种维度。他以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的关系为例加以阐明,前者指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阐释世界的模式的差异;辩论对话是巴洛克艺术对文艺复兴哲学思考的否定;结构对话则是巴洛克文学用于挑战文艺复兴文学的平衡统一,以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作为创作的观念,悖论产生虚幻,虚幻则提供更高的真实,释放神灵、死亡等主题;最后的历时对话乃是两个时代间“连续性的考察”<sup>[8]265</sup>,通过四维对话来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时代。回首这些深受巴赫金理论启发的、追溯归纳的对话模式,多少潜在地与其所说的梅尼普讽刺等文体形式一起为小说的复调模式奠定了创造的基础。

在复调小说中,任何主人公都是作为单独的个体,就思想立场进行对话,即便是自白也是应答辩驳形式,具有开放性的效果,表现出广场时空体形式的特殊性,那么,在这样的书写文本中,时空体的具体表现又是怎么回事呢?从时间层面来说,陀氏小说的时间几乎不用连续性的历史时间,没有主人公的生平经历,他们的成长历程、性格发展和感知流变等历史时间都被融化成思想立场并通过交流呈现出来,其时间往往是“此时的一瞬间,就其内在含义来说相当于‘亿万年’”<sup>[3]198</sup>,实际上不受日常时间的控制,有如陆机《文赋》所言“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其时间点往往是在危机、转折、灾祸和兴奋的时刻,说到底,就是一种狂欢化了的时间、狂欢点上的时间,一切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出来。就空间层面而言,小说则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场所,超越了既有的空间观,主要集中在大门、入口、楼梯走廊等边沿上,这些地方是中介之所,联结着上和下、内与外、现

实与虚幻等两个异样的、矛盾的但又相互并置的、交织的世界,它们往往是发生危机和转折的场所,或者用客厅、大厅、饭厅等地点代替广场,那里正在进行狂欢、闹剧和灾祸。巴赫金提到《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是《群魔》里那些“在普通的‘正常’的生活进程里,都太突然、太不适宜、太不协调、太难想象了”的场面,上演的是“狂欢广场生活所特有的逻辑”<sup>[3]193</sup>,实质上,无论是中介、转折和灾变之地,还是“正常”生活的场所,都是狂欢节的广场,在那里各种怪异的事情都会发生,在那里现实与虚幻关联起来。所有历史进程的、传记生平的时间都聚集在那里,在那瞬间就可能存在转折和变化,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个点上的时空体将其长度、广度和深度都凝缩、聚集,然后像原子弹那样炸裂开来。就是说,在那块小地方、那个时刻就是爆发积怨、挑衅和出格等怪异事件和狂欢化的互动交流的定点场所。所以,梦幻虚构并非缺乏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依据,或者只是作者迷恋外表的虚假和浮想。恰恰相反,它是其现实主义的基础,也有其所表现出来的世界感知和精神风格,以及表现这种精神风格的结构模式,其结构模式则决定了文本书写的内容和思维的形式。总之,那里没有主观性的虚幻、想象和杜撰的东西,只有真实、现实和真相的呈现,即有其历史、现实与文本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同一。

### 三、最高现实——文学虚构世界中的广场时空体

韦勒克对现实主义颇多批评,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往低层看,它会沦为新闻报道、论文写作和科学说明,退化到非艺术的实用写作领域;往高层看,许多著名作家、现实主义者都能超越理论藩篱,创造富有想象力的世界。最后他作出结论:“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制作’(making),并且本身是一个由幻想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sup>[9]239</sup>在论及文学的本质时,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特征,“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sup>[10]14</sup>。从根本上来讲,就没有所谓的文学的现实,只有作者“制作”的规则,以及依此而成的虚构和想象世界,“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sup>[10]14</sup>。韦勒克主张文本论,具有割裂社会现实

的新批评理论倾向。所以,探讨文学的现实或现实主义文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甚至是可以取缔的。在文章中,他提到了巴赫金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只是说“见解独到”,接着便就其结论性观点提出批评。巴赫金坚持陀氏创造了一种独特文体“复调小说”,是多声部的、对话的,所有的界说和观点都是对话的部分,陀氏世界中没有最后的结论。韦勒克则认为“这个结论显然是虚假的”<sup>[1]276</sup>,是不真实的,违背现实主义的,如同陀氏小说严重的虚幻性一样。平心而论,韦勒克的主张和批评存在一定的偏颇,缺乏科学性。

巴赫金以物质性的时空体范畴研究了小说模式的变迁。他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所撰写的《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和《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等著述中对小说的时空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形成其特殊的“时空体”理论,并以时空的比例变化梳理了欧洲小说体裁的变迁史,形成了各种具体的时空体类型,使后世学者“得以按照时空体的类型来对各种体裁进行定义和对各种长篇小说进行细分”<sup>[11]367</sup>,构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巴赫金开宗明义地提出,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这里我们不涉及其他文化领域中的时空体)”<sup>[12]274</sup>。就时空体的研究意义,他强调说,“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作为形式兼内容的范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sup>[12]275</sup>。要突出陀氏复调小说中虚幻性和现实性的关系,需要将时空体类型的历史进行对比并彰显其特性才能解决,这样才可能回答有关韦勒克文学本质虚构说的问题。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巴赫金考虑过韦勒克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本身非常重要,他并没有去反对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幻觉和梦魔现象,而是试着为小说幻想和怪诞的体现找到现实主义维度的有力解释。

巴赫金在著述中用时空体“单位”审视了欧洲小说的变迁史,如早期神话等文学作品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但并不局限于其线性发展,而是可以错置、换位的,过去想象成无限美好的,未来不确定而成为末日,现在被孤立且毫无意义,永恒的时间才有价值;古希腊漫游小说则着重

于空间的静态性,时间没有意义,人物性格一成不变;传奇小说则喜欢将时间当作偶然性、转折性来处理,即我们古典小说中所言的“无巧不成书”,以增强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而空间多为散漫的、模糊的和广阔的地理背景;在近代文学作品中,卢梭根据自己的哲学旨向将时间规定为自然循环,将自然景观人格化来沟通人类生活与自然世界的时间关联,但又外接于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好让自然时间成为桃花源的理想境地;歌德的时空观念具有现代性意义,时间与空间被完满地融为一体,时间是生命力的展开,没有所谓绝对的过去和彼岸的未来,只有可能性和成长的现在,并与空间的物质性关联,“在歌德的世界里,不存在对确定的、空间发生地毫无联系的任何事件、情节和时间因素,也不存在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事件、情节和时间因素(即‘永恒的’情节事件)。在这一世界中,一切都是时空,都是真正的时空体”<sup>[12]258</sup>。巴赫金不仅分析小说体裁史与时空体的关联,由此透视了著名作家作品的风格特性,并且试图找出时空体的物质化形式,也就是其背后的现实场所的具体标的。

从本质上说,时空体其实就是现实本身,有真实场所的存在。格雷厄姆·佩奇(Graham Pechey)指出,时空体概念最好被“时空体化”地理解,“它从未完全摆脱其起源的时空标记;其自身的时空体性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意义的组成部分”<sup>[13]83-84</sup>,抽象化形式是能够物质化的、具体化的。综观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论述,不难找到各类文学作品里地方、处所或环境等具象化的现实体,如自传和回忆录使用的“罗马家庭时空体”、展现自然更替的“田园诗时空体”、卢梭的“自然时空体”、巴尔扎克作品的“沙龙客厅时空体”、哥特及黑暗文学的“城堡时空体”、传奇小说的“道路时空体”等<sup>[14]</sup>。具体的地点型时空被用于阐明文学的现实主义基底,又决定了小说体裁和风格特性。换句话说,现实才是作家构思及其文学表现的最终根源。但是,时空体在小说话语中,由于叙事的虚构本性,是用语言来表述的现实,是现实的虚拟化。正是在此,韦勒克才表明其新批评的立场,文学从本质上是虚构和想象的。我们认为,在巴赫金那里,时空体带有超越性,能更好地处理现实与虚构的平衡、统一。田园、道路和自然,以及客厅时空体本身是日常生活中具有的,或者说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常见的,离现实性更近一些。如果要展开小说的虚构

性,就要在时空体基础上关联更广阔、更深层的社会现象,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用客厅展现时代的风貌,交织着公共与个人、对抗斗争、贵族生活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嘴脸,都是在特定场合下围绕小说主题旨向、情节事件设定、人物形象塑造和阶层化语言等整体构思而成的,它变成了一种典型环境,用于达到文学的目的。在这些时空体的现实化地点中,唯有城堡时空体是例外,它更多地体现出宗教、巫术仪式和贵族化生活的现实性,并非普通民众生活和日常遭遇的场所,是有阶层性、文化性和神秘性的特殊建筑物。尽管复调小说中的现实体表现出多种场所,如街道、阶梯、门槛、走廊等边缘化地点,当然也包括客厅、剧场和小省城等非边缘性的实在空间,但是陀氏都将其处理成狂欢化的广场。广场才是复调小说中时空体的真正现实,它是民间节庆的场所;广场的节庆活动同样不是日常性的,而是一种特殊的仪式,但又像城堡那样处于现实生活中。

巴赫金注意到陀氏小说与黑暗、哥特文学的关联,它们都勾联着两个世界:作为现实化、正常性、物质型的生活世界与作为狂欢化、非常态、意识性的超越世界。从人物上说,如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梅里金不合时宜、近乎天真,总是处于与社会确切位置不同的与生活之圆相切的切线上,是个“白痴”,而菲利波夫娜也是游离于普通生活的人,还不时出现病态的紧张,是个“疯子”。如果说前者是明朗、欢快,那后者则阴沉、黑暗,两者分别代表狂欢节的天堂和地狱。在情节上,小说笼罩着狂欢和奇幻的气氛,从列车的三等车厢开始讲述,类似于广场,车厢里坐着穷公爵梅思金和腰缠万贯的年轻人罗戈任,两人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都相当不得体,随意闲聊、自由坦率,各种回忆、思想和奇怪的话题都能和盘托出。在具体场景方面,如在叶潘钦家里,梅思金与侍仆聊起死刑、道义和痛苦等极不相宜的话题;在叶潘奇娜的上流社会客厅里,梅思金则讲述了死囚意识的最后时刻和玛丽的精彩故事,都“显得不是地方”,“充溢着狂欢体的坦率态度”<sup>[3]234</sup>,将整个聚会都带入狂欢氛围中;菲利波夫娜则在伊沃尔金府上扮演毫无廉耻的交际花,把将军误作听差破口大骂,有喝醉的将军和其他醉鬼的出现,有讲趣事、揭真相、起冲突、扇耳光和互相挑衅等,府上客厅已变成了夸张的广场闹剧。归根究底,巴赫金认为陀氏小说复调性和狂欢化的体裁风格,以及所

表现的幻觉和梦魇等内容,其实都被广场模式加以处理了,都是现实主义的。因此,怪诞本身就是这种时空体的产物。

在拉伯雷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则注重语言及其结构性的狂欢化表现。如在传记序言中,拉伯雷将戏子、郎中和商贩等人物口吻相互结合,将医学、艺术和宗教等学科知识互相交叉,在叙述中用一种戏谑和吹嘘的口气发誓说,谁能指出一本比《大事记》更好的书,他就付出“半品脱肠子”。实际上,“放肠子”有宰杀和死亡之意,肠子在肚子里,肚子孕育生命,又与分娩有关;肠子既“吃”事物,是粪便集中地,价值甚微,甚至是最低贱的,然而它又是“吃”的对象,是要清洗和洁净的;灵魂在肚子里,是肮脏的,清洗则意味着复活和新生。《大事记》被当作《圣经》,卖得比《圣经》还多,凡是不认同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念,都是异端、骗子、叛教者、诱惑者,即是魔鬼,要像所多玛、蛾摩拉那样被硫磺、大火吞噬掉,这些插科打诨、戏仿诙谐、瞎扯咒骂的胡言乱语就是广场话语,集赞美和辱骂、怪诞和常态等对立要素于一身,是双面的雅努斯,“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处于未完成的变态之中,处于从黑夜向清晨,从冬季向春季、从旧事物向新事物、从死亡到诞生的过渡状态之中”<sup>[15]188</sup>。语言是世界的折射,其所构成的怪诞和幻象就是广场世界的古老反映。总之,拉伯雷喜欢描写巨人的撕咬吞咽、畅快排泄、挥舞打砸,还有酒精、食物、血液、仪式、图腾、生命力等,它们都永远处于不断的形成、交流和转变中,蕴含等级制的狂欢、快活的死亡、送葬过去和现在、笑对未来、新生命的呱呱坠地等,都是辞旧迎新的历史快乐感,是时间性本身和怪诞、沉留与遗物在空间场所的新形象展现,也是日常生活向诗与远方的梦幻和自由,是世界中间状态的过程、转变和对抗交织的现实建构。

时空体就是现实,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巴赫金引述了陀氏自己的话,“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sup>[3]79</sup>,并从广场时空体视角剖析了其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和场景的狂欢化美学。而在拉伯雷研究中总结出辩证论的哲学意义:广场时空体不仅仅是眼见的、不变的和限于日常生活化的,还是开放的、转折的和新生的,也是充满各种怪诞事件和梦幻虚构的。任何个体的文学都只是局限于自己对世界真实的感知和书写,拥有其独有的时空体形式,假如用广场时空体形式观察

世界,那么梦幻与怪诞都是现实的。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指出,“面对人类的存在,世界彻底地变了,原因恰恰在于世界无法被人类的意识所控制”<sup>[16]251</sup>。由于人类节庆广场活动的存在,世界就是狂欢化的,无法被人类意识所控制的世界只能化作主人公的思想立场不停地对话下去,在巴赫金看来,复调小说正是如此。

在巴赫金看来,陀氏小说的生命力源泉就是广场的狂欢化现实。这一现实有着俄罗斯、欧洲民间节庆的传统以及所形成的时空体感知方式,并决定了其小说体裁风格的发展史,并由此发现了资本主义尤其是俄罗斯社会的现实本质,也是他本人在彼得堡的体验和对报刊媒介职业思考与感悟的结果,从而将其作为小说的结构模式,发展出复调小说的当代新文体。作为时空体的现实场所,广场上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他们拥有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当下亲昵交往,时间被空间化展示在各种狂欢化活动中。表现在内容上,人物角色将社会人生融入思想意识,在那些边沿性、实在化的场合,参与不同思想、意识和价值立场的交锋,呈现幻觉、梦魇的考验和回忆、生活的思考交织而成的戏剧冲突的画面;形式上则在继承传统狂欢体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广场时间是瞬时的、当下的,空间则是中介的、过渡的,它们联结不同的多元世界。欧洲小说传统都有其不同的时空体及其现实形式,复调小说则以广场时空体构建人物形象的边缘化和异质性,其自身存在表现出应答、辩驳和挑衅的对话性行为,小说情节发展、场景环境等都具有狂欢化效果。广场节庆活动本身既处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又超越社会秩序和规矩,其本身就是边沿,却是开放的现实,可以不停地穿行在如现实与幻象、怪诞与正常、死亡与重生、自身与他者等对立要素之间。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就是典型的广场性文学,作为一种结构模式,广场时空体不仅影响其内容书写还有其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让文学书写的常态生活和虚构幻象合二为一。在此,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达到了某种结合,这就是现实主义文论的宣示和颂扬。

#### 参考文献:

- [1] 勒内·韦勒克. 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  
[M]. 刘象愚, 杨德友,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 王志耕. 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

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3]钱中文.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Bemong N, Borghart P, Dobbeleer D M, et al. Bakhtin's Theory of the Literary Chronotope: Reflections, Applications, Perspectives[M]. Gent: Academia Press, 2010.

[5] 戈戈基什维里.巴赫金复调小说与复调音乐的相互关系——论题再探[C].刘柏威,译.//周启超.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9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

[6] Boháček K. Between Socrates and the Stranger: How Dialogic Are Plato's Dialogues? [C]// Freise M. Inspired by Bakhtin: Dialogic Methods in the Humanities. Brigh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8.

[7] Freise M. The Dialogic Method in Literary History [C]// Freise M. Inspired by Bakhtin: Dialogic Methods in the Humanities. Brigh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8.

[8] 王晓菁.文科无用?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再思考与再应用——评《巴赫金的启迪:人文科学中的对话性方法》[C]//周启超.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8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9]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罗钢,王馨钵,杨德友,译.曹雷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0]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1] 扎哈罗夫.作为历史诗学问题的时空体[C]//周启超.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 钱中文.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3] Pechey G. Mikhail Bakhtin: The Word in the World[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4] 薛亘华.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内涵[J].俄罗斯文艺,2018(4).

[15] 钱中文.巴赫金全集·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6] 米哈伊尔·爱泼斯坦.“原始以表末”——巴赫金与人文科学的未来[C]//阿拉斯代尔·任甫卢,加林·吉哈诺夫.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汪洪章,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Fantasy Fiction and Chronotope: Realistic Issues in Bakhtin's Poetics

LIU Yabi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fictional nature of literature proposed by Wellek conflicts with the literary theory of real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ity and fiction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realism, and the chronotope has become an unavoidable problem. Bakhtin thinks that the fantasy fiction of polyphonic novels reveals the traditions of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e. Square festivals are the ultimate root of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m and Russian society, and learning from and thinking about Dostoevsky's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 reality of square carnivalization and its way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content expression and textual form of Dostoevsky's novels, forming a chronotope concept that combines intermediate space and instantaneous time. Seen from the form and proportion of chronotope, European novels have their specific temporal and spatial expressions and real-life place markers. Through the square's chronotope, the world of reality and fantasy, normality and grotesque, death and birth can be intertwined and transformed. Polyphonic novels reflect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of realism, and Bakhtin's poetics has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realism.

**Key words:** Bakhtin's poetics; realism; fantasy fiction; chronotope

(责任编辑 合壹; 实习编辑 郑安然)